

中国计量大学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 国内学科建设发展动态

【2016年第4期（总第13期）】

中国计量大学发展规划处编印

2016年12月10日

# 目 录

## 【学科评估】

1.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思考..... 3
2. 为真正实现“以评促建”的目的，对“拼材料”“数帽子”“论牌子”等现象——第四轮学科评估说不..... 17
3. 175所高校576个学位点为何主动撤销? ..... 22

## 【双一流建设】

4. 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 28
5. 年轻大学借助国际化走向一流..... 39
6. 大学综合改革再起 为“双一流”建设探路..... 44
7. “双一流”建设中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型发展的若干思路——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 48

## 【战略与政策】

8. “111计划”将建100个世界一流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63

## 【它山之石】

9. 山东大学出台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 65
10. 江苏大学：开足“双引擎”，聚力“双一流” ..... 68

## 【高教视点】

11. 学派消失大学难以卓越..... 72
12. 改革就要放权给院系..... 75

## 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思考

- 学科评估核心争议点是什么
- 评估结果的合理使用及学科评估的改进
- 评估是否与资源配置挂钩

**编者按：**时下，第四轮学科评估正在紧张进行中。从 2002 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中心）推出首轮学科评估以来，经过 14 年来三轮学科评估的不断调整运行，从最初的 1300 余个学科参加发展到今年参评学科 7450 个，学科评估不仅吸引着高校的目光，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学科评估的意义何在？它该如何通过指标体系设计引导学科建设？日前，由光明日报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学科评估与学科建设”沙龙上，专家学者们会聚一堂——

### 出席嘉宾：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瞿振元
光明日报社副总编	刘 伟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王立生
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	聂祚仁
西安交通大学常务副书记	王小力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	蒋传海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白海力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马陆亭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光礼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 田延辉

## 1、开展学科评估是正当的、必要的

**刘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这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到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诸位专家有很多经验和思考，我在此提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媒体经常提给学校的，以此作为本次沙龙的开篇。

第一个问题，以前大家问“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无缘”，现在我们已经有人获这个奖了，所以问题变成“为什么中国与诺贝尔奖缘分很浅”。

第二个问题，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钱学森之问”。一谈到高等教育的建设，政府急，教育部门也急，高校也急，当然更加着急的就是需要人才的部门以及家长学生，我们媒体也很急。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很多好事不是急就能够急出来的，大量的工作需要步骤地推进和解决，这也是我们现代化社会专业分工、科学分工、教育分工这种分类细化的结果。

**王小力：**刘伟副总编辑提的这两个问题，我先做个回应。关于第一个问题，三年前我跟斯坦福大学校长讨论过高校产生诺贝尔奖的问题。当时她介绍了斯坦福大学主要从五个方面推进这件事情：首先是学校要引导专家学者们去讨论世界问题，要获得诺贝尔奖，你的定位要高，关注的得是人类问题、世界问题。我自己也在教学科研一线上，国内专家学者

有时候想世界问题少了些；第二就是学校要积极促进专家学者学术合作；第三要搭建高水平交叉型、多学科、多领域科研平台；第四是要有导向性地让专家学者们走向全世界；第五是要有充分的资源保证专家学者们潜心专心地做基础研究。

关于“钱学森之问”，国内高校都在讨论，我的看法是，我们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其实是因为我们教学和科研人才培养被分割开了。当然这个观点不一定对，但是我们今后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发展过程中确实要思考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学科是学校的一个基本单元，一个大学如果有活力、有创新力、有生命力，一定会体现在学科上，而我们现在往往讲学校讲得挺多，学科讲得比较少，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整个一个大学的发展重心放到学科上去。

**蒋传海：**科学的学科评估能够有效促进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同一学科比较具有可比性，学科评估相对大学排名更加合理，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教育评估手段，它提供学科诊断和监测，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政府、大学、社会等不同主体都需要这个评估。

**聂祚仁：**从我们北工大发展自身来讲，这些年对学科评估和建设还是重视的，包括这次参加第四次学科评估，学校也还是很重视，也做了专门的讨论。前几轮评估，我们几个重点学科，包括几个老的国家重点学科，像土木工程、材料、

光学，和这几年新发展起来的环境，以及传统的几个信息学科等等，都应该说是通过学科评估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对我们的平时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性。

**马陆亭：**学科评估是有其合理性、正当性并且符合逻辑的。我一直认为，学科评估是正当的，学科是一个知识分类的体系，也是一种制度安排，从知识分类的体系也好，从制度安排角度也好，都可以有做得好、做得坏，是可以做出这种区分的。另外，我们学校投入很多都是公共投入，公共投入是需要评估的，所以不管从很多道理来讲，搞学科评估我认为站得住脚的、是有道理的。

**瞿振元：**我也认为开展学科评估是正当的、必要的。学科评估的设计要从一开始就要注意科学性和导向性。客观地说，在当下的高校中，抓学科约等于抓科研，抓专业约等于抓教学，校领导的分工也大体如此。我们要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考虑评估如何推动教育健康发展，推动高校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有助于克服“重科研轻教学”和忽视本专科学学生培养等不良倾向。

**周光礼：**现在有一种说法，即在管办评分离治理架构下，政府是否有权组织学科评估？我认为，政府当然有权评估学科，我们知道没有评估就没有管理，政府只要有权管理大学，就一定有权评估大学和学科。只是评估作为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活动，政府需要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做这个事情，政府可以购买评估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位中心的评估实际

上是政府委托的评估，政府把学科评估这种特殊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学位中心来行使。

第四轮学科评估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资源配置？我认为，第四轮学科评估一定会影响大学的资源配置。因为学科评估会影响大学的地位，不管学科评估与资源配置是硬对接还是软对应，都会产生影响，这跟我们国家大学的资源配置模式是有关系的。大学的资源配置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中心模式，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模式。我们国家大学资源配置模式可以概括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一方面政府在大学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近年来开始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于学位中心的评估实质上是政府委托的评估，政府肯定要用评估结果，第三轮评估很完美，很多政府机构直接用了，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硬对接了。退一万步说，即使第四轮学科评估是纯民间的，一样会影响大学的资源配置。因为老百姓是通过一些信号指标来判断大学质量的。

我认为通过学科评估来确定大学地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巨大进步。我们传统的大学地位的生成机制是政府指定模式。从 1954 年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6 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到 1978 年指定 88 所大学为全国重点，从七五期间重点建设 15 校，到“211 工程”“985 工程”，大学地位是行政决定的。政府指定模式容易造成身份

固化，抑制大学办学活力。通过评估确定大学地位，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引入竞争机制，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是自发生长逻辑，另一种是人为设计逻辑。前者是学科发展的内驱力，后者是学科发展的外驱力。我们国家所崇尚的建设逻辑，就是人为设计逻辑。我们大学经常谈学科建设，我们的政府也要建设一流学科，“211工程”“985工程”都是建设学科，“两个一流”也是建一流学科。我们认为在一个国家的学科发展内驱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外驱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211工程”“985工程”和“两个一流”建设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长期来看，如果这些大学、这些学科对政府有强烈依赖性，这是不行的，迟早还是要让学校自己来承担学科发展重任。

值得指出来的是，学科评估也有两种，一种外部问责性评估，主要由政府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另外一种叫作自我改进型的评估，就是以学校为主体请国内外同行专家进行的学科国际评估，我认为要逐步由这种外部问责性评估转向自我改进性评估。政府投入了当然要评估，这就是问责性评估。如果以后政府不重点投入了，学科发展是学科自己的事情，自然需要自己的评估。

## **2、学科评估不是争名次，而是找“短板”**

**蒋传海：**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很多高校的管理者希望把参加评估作为学科诊断、摸清学科家底的机会，以便深入



了解每个学科在建设中的“短板”以及国内同类学科的位置，并以此作为督促学院院长开展学科建设、发挥学院学科建设主体地位的外部机制；同时评估结果也为很多高校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顶层设计，促进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以后，我校就把每一个参评学科的评估报告全部购买回来，并组织每一个学科深入研讨，这对我们制定新一轮学科发展的规划，包括新一轮学科发展指导思想和建设方针、学科的布局、各学科发展的目标、学科结构的优化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立生：**关于学科评估的目的，我们现在提出了四个服务的理念。

首先是服务我们的高校，为学校学科建设提出一些可以参照的内容，最后由学校自己去采用，在诸如内部建设、学科规划、学科管理、学科内部评价等方面提供支持。

其次是服务政府，我们这些年的学科评估尝试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较典型的就，是，财政部对高校学科建设提供支持也参考了我们的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此外像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省里的高校学科建设方案，很多也都是依据我们的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的排名情况来考虑的。

再次是服务社会，现在每年一些媒体都会把学科评估的结果公布出来，学生报考高校选学校、选专业时就会拿来参考。按照现在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未来高考报专业

将会是“专业+学校”，过去是“学校+专业”，现在学生看到的首先是专业，然后看后面是哪个学校，所以有人预测，我们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对明年高考学生选专业可能有更直接的参照价值。

还有一个方面，国际社会现在迫切需要了解中国教育，需要了解中国的教育水平。学科评估的宣传效果对他们来说是最直接、最直观的。现在外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前选专业、选学校，学科评估给他们提供了直观参照。同时，也通过服务这种需求，在国际上发出了中国学科评估自己的声音。

**周光礼：**政府在利用学科评估数据的时候，最好是建立一个二次评估数据库，二次评估数据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政府认为所有的学科排名都有可取之处，一个学科在任何排行榜中表现都很优秀，这个学科一定很优秀，一个学科在任何排行榜中都很差，这个学科一定很差，一个学科在有些排行榜中很优秀，在有些排行榜中很差，那说明它有特色。因此我们政府要承认，所有的学科排名都是有道理的，然后把他们收集在一起，组织专家对每一个榜单进行专业鉴定，给每个榜单赋一个权重。比如说某个评估非常靠谱，可以计为5分，另一个评估不太靠谱，就计为1分，最后加权就得到一个学科的综合评估结果。

**马陆亭：**不管多么好的学科排名，在制定的时候一定要反复想怎么有利于高等教育的生态发展，有利于高等教育内部学科的生态发展，这种生态可能是我们学校最关心的。想

法再好，一旦有违背生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适时调整了，而且评估结果出来以后，不能恶性竞争。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挖“学术大咖”，各省市都出了招揽政策，结果我们国家的总量没有增加，各个地方花了那么多钱，总量却没有增加，反而对学校造成了干扰。

**瞿振元：**在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里，抓学科建设是学校的责任。对学校来说，要有学科意识，使校内的学科协调发展、特色发展，要考虑学科之间的生态关系、互动关系，不能搞学科孤立。在一个大学里，往往是“学科群”的建设问题，学科之间相互支撑，有骨干，有前沿，也要有后援。这也可能是大学的学科建设优于一般科研院所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在 211、985 建设中，有不少好的经验。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争名次而不顾学术生态、盲目砍一些所谓的“无用之用”学科，或忽视学科的生长性而扼制那些目前处于相对弱势但长远看很有希望的学科，这对学校的整体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学科评估和学科建设要支持破除学科壁垒。当今学科生长点，大量发生于学科交叉中，我们应当创造这样的条件，支持创新发展。

### **3、让学科评估回归到内涵建设本身**

**王小力：**学科在发展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三个面向”观念，要以“三个面向”引领学科发展，即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我觉得这应该是学科未来做大做强的科学发展之路。我认为通过学

科评估和学科建设，把真正的学科建设引到“三个面向”上来，但是目前这方面还比较欠缺。目前，学科建设存在同质化、缺乏特色等问题，实际上学科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对学科的打基础、谋长远的事情想的太少，而国际一流大学，对于学科长远的谋划是非常深的。我们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布局也缺乏良性的淘汰机制，也就是要解决好学科能上能下的问题。

所以学科评估，我们觉得一轮一轮发展到今天，正在越来越完善，我们现在对学科、对学科的定位、对学科的功能以及对学科的缺陷的认识，越来越清醒了，可能未来把它引导到或者说让它回归到一个真正的学科建设轨道上来。

我们希望评估工作不要变成一个“面子工程”，评估的真正内涵要推动各高校的学科建设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符合学校特点，更加凸显学科特色，有些学科现在可能弱一些，但未来可能是国家战略必争学科或者战略布局学科，还需要继续办，并逐渐办好。现在一些学科可能还有差距，还需要国家和学校的扶持而不是害怕受牵连而“割尾巴”。评估也不要成为一个“拼盘工程”，更不要变成简单的争资源工程，一定要从高校的学科发展规律中去挖掘内涵，真正把大家引到学科质量和水平提升这个方向去。

**王立生：**我们第四轮学科评估有几个方面的创新性举措。

第一是适度淡化条件资源，关注成效跟产出。不再只计算基地、中心的数量，主要看学校的建设成效如何、产生的成果如何。

第二是对师资队伍评价做调整。过去我们看学校有多少长江学者、两院院士。这次我们重点看学校整个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情况，包括整个师资队伍的结构、国际化程度，还要考察青年教师队伍和年龄梯次结构。

第三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了过去对在校生的评价，再增加两个维度，一个是过程评价，还有一个是毕业后评价。

第四是在科研评价方面，我们做了几个方面的改进：首先是对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做了一些技术改进和对接，从而体现中国式的ESI评价；其次是学科评估加强了对中国期刊的带动力度；再次就是增加了学科建设的社会声誉评价；参评规则上我们坚持绑定参评规则。

第五是我们推出了一个“归属度”办法，就是说几个学科共同做出一个成果，几个学科来商量，各自在成果中贡献了多少比例，然后在不同学科里分别填报。

最后是要强化后期数据服务。

我们第四轮学科评估没有公布权重，为的是防止填报材料的时候大家盲目追求权重高的地方堆砌材料，所以我们只公布指标体系。未来权重的产生，首先是我们提出一个方案，所有参加主观评价的专家都有权提出关于权重的意见，我们把所有专家的意见汇总之后形成最终指标体系。

**蒋传海：**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评估指标、评估过程和评估方法较之第三轮有了十分明显的优化和改进，我们期待有效果更好的评估结果出来。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有的高校预期新一轮学科评估结果会与未来的资源配置挂钩，特别预期会和“两个一流”建设挂钩，使得个别学科整合成果和材料把优势学科的评估名次搞上去的功利化思想有所增强，诊断学科找短板，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提升学科实力和水平的初衷有所弱化。所以虽然本次门类“绑定评估”解决了相近学科随意整合的机制性问题，但在后续公示、数据核查等环节还要认真查证，进一步保证评估的公平公正。

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科评估的功能，我有以下几个建议。第一，要让学科评估真正回归到学科内涵建设本身。政府需要学科评估，学科评估也应该为政府绩效导向的资源配置提供决策支持，但政府还是要避免一些资源配置单一的和评估结果直接挂钩，尽量使用多元化的因素、多渠道的信息引导资源配置，弱化学科评估的功利化，回归学科内涵建设本身。第二，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建立监督机制，推动第三方学科评估的健康发展，促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可靠性。第三，要建立学科数据填报的长效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教育管理信息化体系，逐渐使得第三方评估工作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基础之上。

**白海力：**学科评估有它自身的定位，有它服务的对象，有它本身的属性，不能把我们高校自己该做的事，让学科评

估机构代替去做。蒋副校长说的结论我是赞同的，就是不能让学科评估承担不能承受之重。刚才您提到的很多问题，我认为实际上是我们高校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比如：无论有没有学科评估的数据需要，高校都应该建立完整的毕业生及校友信息管理系统。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学科评估本身或者指标体系出问题了，而是我们在理解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以及考虑如何使用学科评估结果的时候，认识上出了问题。再比如，第四轮学科评估对人才培养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放在了首要位置。这实际上就是考察我们高校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到底把“人才培养”放在什么位置上。从目前高校“指标竞争日益激烈”现实情况看，有多少高校能够淡定地做到把“人才培养”放在日常工作重要性排序的第一位？

对于第四轮学科评估，具体来讲：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迫切的需要一种声音来引导我们的工作。人才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管理得到不到位？学生毕业离校后，学校还管不管？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答，那就是“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所以，如果高校关注学科排名，就不可能再把人才培养置之一边，只抓科研指标，只抓国家科技奖，只抓科研经费，这就是第四轮学科评估对于高校内涵发展的引导。第二，从国家数据安全角度来讲，国外“高校以及学科排名”指标体系，如 US news、THE 以及 QS 等采

用了公开的数据或向高校索取数据。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数据不完整，不能全面反映中国高校的教育状态，尤其是目前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第三，从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目前进行中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尚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但是我认为，在现行国内外各种评估体系中，它是最符合中国高校发展现状、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和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高度契合。同时，我们也不要避讳提及评估结果和“两个一流”建设的结合。“两个一流”建设是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举措。在这个奋斗与建设过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使用中国自己构建的国际标准吗？难道“世界一流”的标准就一定是 US news、THE 和 QS 的标准，就一定是 ESI 吗？我们应该从更加积极的角度，关注、关心和支持中国自己的“学科评估”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具体体现。

**瞿振元：**我支持我们自己的学科评估，不仅要在国内能做好，而且走向世界。但也要注意，学科评估只是学科建设中的一个环节，还是要以评促建，重在建设；评是一时，建是经常，贵在积累。要明白学校建设、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各自的内涵，辩证处理其间的相互关系。“两个一流”建设，作为国家的又一项标志性工程，不仅要考量学科水平的高下，而且应当综合考虑包括区域布局、产业所需等重要因素，进行战略性思考和战略规划。（《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2日）



为真正实现“以评促建”的目的，对“拼材料”“数帽子”“论牌子”等现象——第四轮学科评估说：不

第四轮学科评估进程过半，评估结果呼之欲出，“评估”再次成为高校内外关注的焦点。

自 2002 年以来，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中心）自主开展的学科评估经过 14 年运行，已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高校、公众，甚至国际同行的重视。自愿参评的学科，从 2012 年第三轮评估的 4235 个，增至今年的 7450 个，普通高校中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学科参评率从 80% 增加到 96%。

曾经时有争议的评估缘何日益受到高校的认可，本轮评估为纠正参评乱象做了哪些调整，其现实针对性是什么，又在指标体系设计中如何引导学科建设甚至高校的未来发展？本报记者近日独家专访了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王立生。

### 以“绑定参评”避免“拼材料”“摊大饼”

**记者：**为了让某一学科在评估中有利，以往个别高校可能会将校内相近学科的材料进行所谓的“整合”，“拼凑材料”一说由此而来，并饱受诟病。对此，本轮评估有什么针对性的举措？

**王立生：**为避免学科间拼凑材料，第四轮学科评估在要求参评高校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填报材料的同时，采取了按

学科门类“绑定参评”的规则，即“同一门类下具有硕士一级授权及以上的学科要参评同时参评，不参评都不参评”，从而有效抑制了相近学科材料不合理整合现象，最大限度地保证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反映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

当然，考虑到目前交叉学科的迅猛发展，产生的成果往往由多个单位的多个学科人员共同完成，为准确反映各自的实际贡献，本轮评估又完善了“成果归属原则”，即人员和成果均可按此原则拆分体现在不同学科、不同单位，以此鼓励学科交叉与合作，客观反映跨界（跨单位或学科）研究成果。

**记者：**“绑定参评”在高校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

**王立生：**“绑定参评”的推出超出我们的预期，得到了参评单位的高度认同，99.6%的问卷调查反馈意见支持采用这一办法。但“绑定参评”不只是扼制拼凑材料，同时也对一些高校学科“摊大饼”的现状构成了压力，给高校内部优化学科结构布局，突出优势特色、优化资源配置既提供了契机，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所谓“摊大饼”，一是高校在扩招过程中盲目增列学科点，重布点轻建设现象长期存在；二是一些高校合并后相同学科并存的现象也不鲜见，学科因人而设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学科规模过于庞大，特别是在国家“动态调整”政策出台之前，学科建设没有退出机制。

此番“绑定参评”，使那些发展长期滞后的学科不能回避建设成效的评估监测，这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这些学科“以评促建”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让高校下定决心对这些学科进行适度的调整乃至裁撤。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家“动态调整”政策的实施，但无疑也给学校内部管理带来挑战和契机。

所谓挑战，是任何学科的调整和裁撤背后都涉及人员的调整和利益藩篱的突破，难度很大；所谓契机，是学科评估让学校、学科充分、理性地认识到自身在全国的发展状况，结合自身定位和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借机果断作出“动态调整”决策。从这个视角，我们也看到了学科评估对高校和学科发展产生的“以评促建”功能。

### 用指标体系规避“数帽子”“论牌子”

**记者：**以往的评估较为重视量化指标，造成高校在追逐资源、追逐有头衔教师上过于功利。对此，本轮评估有什么针对性的举措？

**王立生：**本次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对师资规模、重点实验室等“条件资源类”指标，采取适度降低分量的做法，强调学科评估的基本定位是学科整体水平评估，评价的重点是学科发展的成效和学科建设的质量，重在“输出”的成效质量而非“输入”的条件资源。同时，本轮评估为克服“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片面性，由以往“客观数据评价”改进为“基于客观数据的专家主观评价”，不再直接“数帽子”

“论牌子”，而是重点考察“代表性骨干教师”以及科研团队的结构质量，即由主观评价专家综合考察学科的师资队伍的水平、结构、人才梯次、国际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调要有一定数量的青年教师，避免以前学科队伍中时常出现的“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现象，鼓励学科支持青年教师学者的成长。

**记者：**本轮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将什么指标放在首位？

**王立生：**高校和学科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培育人才，因此本轮评估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指标体系的首位，首次在评估中提出了“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三维评价模式，按照这一评价模式，本轮评估不仅将创新创业成果纳入在校生质量考察指标，还要开展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从学生角度考察导师的教学指导质量，同时跟踪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质量，将学科建设质量评价的话语权扩展到教师和教育系统以外，关注高校培养学生的社会认可度和学用契合度。

### **评估结果会和“双一流”建设的资源分配挂钩吗**

**记者：**当前，参加本轮学科评估已经成为许多高校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固然与上轮评估对高校和学科建设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关，是否也与高校对评估结果会与资源分配挂钩的预期有关，甚至有人认为评估结果会直接影响“双一流”高校和学科的评定。

王立生：学科评估是学位中心面向所有学位授予单位的所有学科自主开展的一项评估服务，而且是以“第三方”的方式组织运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展了 14 年的学科评估，包括现在正在开展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并不是为某些特定项目“量身定制”，也不是经由政府部门授权开展的行政性、强制性评估任务。评估结果被认可而被选择作为资源配置的参考依据或之一，是属于使用者自主的考量。学位中心的任务就是要脚踏实地、科学严谨、公平公正地做好下半程的评估工作。

（《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11 日）

## 175所高校 576个学位点为何主动撤销？

“相对于学校有限资金和博士生招生指标等方面资源，我们学校的学科点显得太多了，所以只能砍掉那些老而实力不强的学科，集中力量支持重点发展的学科。”山东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贾磊说，在今年这轮学位点调整中，山东大学主动撤掉包括系统科学、发酵工程、建筑学等在内 11 个学位授权点。

与山东大学的情况相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近日公布的《关于下达 2016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显示，全国 25 个省份 178 所高校增列 366 个学位点，175 所高校撤销 576 个学位点，部分包括博士学位授权点。此轮撤销无论数量还是学科层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 学位点调整是为挤进“双一流”大门？

采访中记者发现，被撤销的这些学位点大多是与学校学科发展整体规划不符，或者是因为人才培养绩效偏低，比如第一志愿报考学生少、调剂生源不足、导师科研经费少、导师责任心不强、学生研究业绩（专利成果、发表论文等）少、就业质量差。

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马陆亭看来，今年一次性撤销 576 个学位点，主要是各学位授权单位在还“历史欠账”。这说明各授权单位现在更趋理性，对于学位点设

置更注重学校整体学科群和自身办学定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前些年一些高校太过于片面追求学科专业“大而全”、盲目设置专业。现在，学位点“终身制”被打破后，学位点从此实现了“有上有下”。

细心的学者发现，今年撤销学位点数量排名前十的高校绝大多数都是“211”或“985”院校。为什么越是名校撤销的学位点越多？

马陆亭认为：“正因为是名校，其自主调整的空间就越大。比如今年撤销35个学位点的浙江大学，之所以能作这么大幅度调整，恐怕是因为学校一级学位点基本覆盖了所有学科。所以，他们能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大幅调整学位点。”

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学科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基础。在马陆亭看来，这轮调整更深层原因是高校在为“双一流”建设“热身”，特别是名校，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四轮学科评估，它们更加积极主动优化学科结构，希望尽快增强学科核心竞争力。

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说：“此次高校动作这么大，撤掉这么多，是因为有硕士一级或博士一级、二级的都要参评，砍掉这些薄弱、老旧学科能使数据好看点。”为避免部分高校为了保住优势学科，将其他学科成果并入较强学科这种过于强调“排位”现象发生，最新的学科评估将采取“绑定参评”：同一学科门类中，本单位具有博士一级、博士二级或

硕士一级授权的一级学科须同时申请参评。这一规则相当于堵住了将其他学科成果转到相近学科的后路。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王涛说：“从高校切身利益来讲，学科评估讲求整体质量，如果有的学科做得不好，就会‘拖后腿’。这也是高校主动调整的动力所在。”

实际上，对很多高校来说，本轮动态调整只是开始。据贾磊透露：“未来，山东大学还会继续撤销学位点。现在山东大学有 44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等这一轮学科评估结束后，我们准备将排名后 5% 的学位点直接撤掉，倒数三四名的停止招生，后 20% 的招生减半。”

### 学位点“一增一减”意在优化学科结构

“撤销学位点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因为涉及很多人尤其是师生的切身利益，所以在学校内部会有一个严谨而规范的程序。”王涛说，“调整任何一个学位点，既要尊重学术委员会意见，还要上校长办公会讨论，既会考虑学科评估排名，又要评估学科发展潜力。”

实际上，改革中“做减法”并不容易。“将原来费了大力气申请下来的学位点撤掉，学校其实也是忍痛割爱。好在这次学校撤销一个二级学位点，是为了增加一个更好的学位点。”扬州大学研究生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该校撤销了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增加了一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工程（光学工程）”。



2015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规定：“撤销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增列其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一增一减”的背后，折射出各授权单位对于学科群的通盘规划。国务院学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撤销的学术学位硕士点数量是专业学位硕士点的4倍多；专业学位硕士点数量增长了157%，反映出各高校更加重视应用型硕士研究生培养。

以山东大学为例，今年该校增加了海洋科学、社会学、地球物理学3个硕士一级学科，同时撤销了部分学位点。贾磊解释说，专业重复设置造成资源浪费，也是一些学位点被撤的原因，“像今年我们撤掉的系统理论学位点，在数学学院与控制科学和工程学院都有设置，是同一批老师在教，但招生却很分散”。

记者发现，出现专业重复设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各学位授权单位追求学位点越多越好，贪大求全。但在这轮主动调整中，很多高校将早期因规划不合理而设置的专业逐步淘汰。今年被撤掉最多的，是前些年很多高校扎堆上马的软件工程学位点。

也有的高校撤销部分二级学科的初衷，并非其实力不强或存在招生就业问题。一所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虽然现有的二级学科学位点招生生源、培养和就业等情况尚好，但调整到相近的一级学科学位点后，由于硕士专业名

称改变就能吸引更多、更好生源，也有利于整合校内相近学科资源，做大做强一级学科。”

### 动态调整也要警惕人才培养结构新的失衡

也有专家提出，要警惕学位授权点调整中可能会出现“一刀切”现象。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端鸿说：“在调整过程中，也不排除部分高校带有一定的功利性目的，只保留强势学科，借机清除弱势学科，而这些弱势学科可能恰恰是高校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培养必备的基础性学科。如果清除，可能会导致功利性‘错杀’，甚至造成人才培养结构的另一种失衡。”

北京大学古生物学属于“六代单传”专业，每年虽然仅招收一人，但依旧被保留了下来。马陆亭认为：“高校学科是按不同逻辑设立的，有的是遵循科学发展的逻辑，有的是按服务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逻辑，这些专业有的需要考虑市场因素，有的则只需要考虑科学发展需要，不能完全受市场影响。”

学位点被撤对师生有无影响？实际上，学位授权点被撤销后，对在读学生影响并不大。根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规定，主动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3年内实行有限授权，须停止招生，但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权。3年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仍未毕业研究生由学位授予单位转由本单位其他学位授权点培养并授予学位，或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学位。

“学位点调整，可能会造成隐性的学科资源流失，比如学科积淀下来的学科资源、师承关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或断裂。”马陆亭说。

王涛坦言，相关学位点的师生安排是本轮学科调整工作的难点，各个学位授权单位会妥善解决好相关方的利益问题。对于那种重复设置的专业，本来就是很多教师“一岗双责”，不存在分流的问题。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相近学位点的学科，教师的去向问题，确实是学校亟待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9日）

## 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

如果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包括普及与提高两个目标维度的话，那么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除了将发展规模作为一个方面外，也先后实施了一些旨在提高质量的“工程”和“计划”，即重点投入和发展少数大学和学科。先是 1993 年的“211 工程”，之后是 1998 年的“985 工程”，再后来是“2011 协同创新计划”，与此同时，也确立了一些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以及名目多样的人才计划予以优先扶持，最新的内容是“双一流”建设。最新启动的“双一流”建设项目与之前各类工程的侧重有所不同，它将一流学科提到与一流大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将其视为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可以说，该项目的开放度和包容性比以前都有所提高，一些高校即使难以从总体上将世界一流作为发展目标，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在某些优势学科上单兵独进，参与全国性的竞争。但是，从实质上看，“双一流”建设与其他项目也有共同之处，它仍然将世界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以世界一流作为标杆，从而在对比过程中努力将中国的一些大学和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首先意涵着存在一流的学科和学校，进而言之，该项目还意味着将发展的着眼点放在发展的绝对水平上，而有可能淡化办学条件、具体情境、是否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等因素，因为后者是难以衡量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这些意涵和做法是否成立，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 一、追赶心态与学术发展轨迹（略）

### 二、中国学术与世界一流的差距

要回答中国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差距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有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个更为基础的问题。

“世界一流”是一个工作术语，而不是一个学术术语。从学术角度看，“世界一流”的说法成立与否，因学科而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着不同的属性，其横向可比性也是有差别的。一般而言，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而表现出“进步性”的特点，推陈出新是其表现形式，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取代旧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学术研究做前沿与非前沿的区分，因此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研究水平，适合于做相互比较。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学科排行活动就有意义，学科排名的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科则更多地涉及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和文化系统。从空间角度看，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具有同质性，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特殊性，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成为一种价值判断；再从历史角度看，任何社会和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造成以社会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具有恒久性的特征，经典作品被人们所重视，而经典作品往往也是古典作品。因此，对于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言，所谓学术“前沿”和“过时”的说法不太成立。因而，

难以对人文学科的学术水平做出简单明了的判断，学科排行仅有相对意义，见仁见智，共识度不是很高。社会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具有部分的可比性和部分的不可比性。学科的可比性既如此，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大学的可比性更是如此。

总之，无论是学科还是大学，只能是部分可比，部分不可比。在大学和学科部分可比和部分不可比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对“双一流”的提法有一个恰当的认识。具体讲，世界一流建设目标对于自然科学和理工类大学而言，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人文学科和综合大学而言，现实指导意义就比较弱。

基于上述学科和大学属性特征基础，我们来探讨中国学术水平与世界一流水准有多大的差距。在过去一些年，在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学术人员的努力下，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以学术论文发表作为衡量指标的学术产出有了很大提高，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甚至某些研究方向已经跃居世界领先地位，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和《科学》这样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学术论文数量是衡量学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衡量科学研究水平最重要的指标是“原创性”，其中理论创新又是最高层次的学术创新。我们在这方面的学术发展水平如何呢？要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专门系统的研究。

笔者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教育研究偏向于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对于人文和社会学科来说，要去做国际比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笔者所在的大学正在进行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将教学研究型教师作为重点岗位，要求各个二级院系寻找发展“对标”机构。这是一件难以操作的事情，有下面一些原因：首先，许多西方国家的学科建制与我国的学科建制不同，分权制国家往往没有一个国家统一和固定的学科建制，没有官方规定好的学科目录以及按此学科目录建立起来的招生和院系设置体系，更没有官方组织的学科评估及根据评估结果分配资源的情况。这造成很难找到与我们完全对应的学科建制，尤其是对应于二级学科的结构（学院一般是按照一级学科设置，院下面的系是按照二级学科设置）。其次，西方国家的学术系统建立在教授个人学术专长基础上，而教授的跨校流动性很强，所以各个大学学科发展的变动性也较强，不太像我们以机构设置为中心，有稳定的学科建制和学术梯队，有重点学科评估等内容。第三，作为学术制度的一个表现形式，西方学术体系重视学术的个体性和特质性，每一个学者都尽量避免与他人雷同，努力体现自己的独特价值。有时我们会听到国外某个大学的某个研究方向位居全国学科排名前列，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两个知名学者的研究影响造成的。与此不同，我们的学术生态造成了大家都在从事比较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工作。第四，在一些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上，我们缺少与国外学术机构和学者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彼此并不是很熟悉和很了解，在这种情

况下，确定对标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上面四点原因，既可视为确定人文和社科对标机构的困难所在，也可视为是比较不同学科之间的困难所在。

虽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是一个问题，但这并非意味着完全不能做比较。如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学术制度与我们的学术制度有所不同，从学术论文发表来看，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建立了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不言而喻，论文发表的周期长、难度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将发表在某些外文期刊上论文的学术水平看作高于发表在中文期刊上论文的水平也不无道理。同样，从中文学术出版物的市场状况看，多数高水平的出版物都是外文翻译作品。由于我们学术水平的低下和在学术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制造了很多学术垃圾。再从学术制度方面看，在学术自由制度下建立起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具有一些特质。西方学者注重客观事实、价值中立、规范方法的使用、学术批评等，而我们尚没有建立起如此严格的学术规范，从而造成中西方在学术发展态势上的不同。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现在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相反我们仅在使用着这些理论，而很少做出理论上的贡献。为了加快发展步伐，我们采用经费激励和工程管理的办法，虽然带来表面的繁荣，却可能孕育了功利主义的潜在危机。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我们要避免用论文数、经费数、课题数等简单数量指标去做比较，而是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学术制



度，改进我们的学术生态环境，从长计议，用较长的时间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教学是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评价？相比而言，教学效果比研究水平更难评价，因为缺少评价教学效果的客观标准，尤其是难以用常规的方式对学生深层次的认知水平和情感状态加以衡量。另外，教学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教师教的方面，还与学生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和精力投入有很大关系。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大学适龄学生，选择放弃国内的高考而自费去国外上大学，多少反映了中西高等教育教学方面的差异。在国内最顶级的大学中，我们也发现，学生翘课、上课干其他事情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高年级学生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校外实习。最近，在微信中看到留学耶鲁的北大毕业生袁应笑写的“北大与耶鲁差距有多大？”一文，其中不少反讽之处，道出学生对于两校教育状况的感受和心声，如耶鲁重视学生选课的权利，开展小班教学，老师对于学生的提问能够做出及时的反馈，鼓励学生质疑，我们在这些方面则做得不尽如人意。

### 三、后发外生型国家学术发展的误区

现代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这个时期建立的大学机构与之前的教育机构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制度因素。高等教育历史学专家珀金认为，中世纪大学与古希腊的哲学学校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学术自由程度上，而在于结构上，这里的结构实际上就是制度的含义。他说：“大学是一个学

者团体，具有严谨的组织、法人的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章。Universitas 一词在 12 至 14 世纪是一个用得很普遍的词，它可以用来指任何具有共同利益和享有独立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在那个时期建立的大学法人制度使大学组织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从而绵延数百年至今。另外，大学生生命力的增强还与大学与社会之间联系程度的加强有关，大学通过学位、职业资格等制度形式，与外部社会发生联系，越来越深地嵌入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从而日益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起源于欧洲的大学制度通过殖民地和主动学习两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欧洲大学原型与移植国家的具体情形相互作用，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变异，制度形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 19 世纪业已形成的德国大学制度对于美国大学制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数以万计的美国学生前往德国留学，学习德国先进的学术研究内容和学术制度，但是“19 世纪自由市场式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与德国的国家控制和国家提供经费的大学体制有天壤之别。”从历史角度，我们可以将现今的大学制度视为“遗传”和“变异”或者说“稳定”与“变化”两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系统而言，大学制度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断言，中西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就学术制度而言，则大相径庭。他写道：“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

这句简单的话，道出了 20 世纪初中国大学学术领袖对于中西大学制度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异同。作为一种学术制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中国属于大学制度的后发外生型国家。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前进道路并非一条，殊途同归的情况并不鲜见。历史原因造就了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模式。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从理论上讲，后发优势表现在，可以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教训，不用自己去探索和创新，因此发展成本低，发展速度快；而劣势在于，模仿成为一种发展机制，路径依赖原理作用的结果导致缺少制度创新的原动力，在外来的制度与本土的实践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容易出现“内卷式”状况（即有数量增长而无实质发展）、形似而神异或者说外表与内涵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下面，从后发外生型国家高等教育容易产生的误区视角，略加阐述。

**误区 1：形式模仿。**几年前，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叶文欣教授来北大交流，她将北大与伯克利大学发展态势做了一个对比。伯克利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而仅仅是定位于服务加州的发展，但是在履行这个看似渺小使命的过程中，不断追求卓越，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所有世界影响的大学。与之不同，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优秀大学始终瞄准世界一流目标，而不把服务于所在社会作为目的。从这个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发展

逻辑，前者注重于“脚踏实地”，而后者倾向于“仰望星空”。在教育测量学中，有目标参照测验和常模参照测验，借此术语，伯克利属于目标参照发展型，而北大属于常模参照发展型。与伯克利的内在激励、内涵发展模式相比，北大采取的则是外在激励、外延发展模式。

**误区 2：忽视制度建设。**从干预方式角度看，包括大学制度在内的制度形成有人为设计和自然演化两种不同方式。前者也被称为计划模式或者国家控制模式，而后者也被称为市场模式。欧洲大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属于人为设计模式，而美国属于自然演化模式。克拉克在比较欧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后指出：无序方式可以导致有序结果的产生，而有序安排则会产生无序。一些学者在研究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后指出，通过自然演化形式而形成的美国高等教育制度是最不易被模仿的。显然，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大学容易学到的是国外大学表层的东西，而深层次的制度内涵则不容易学。就制度而言，历史传统比外来的现代因素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如果我们从制度视角审视世界一流大学，它不仅是一些数量指标的简单集合，更是制度的复合集合，由外在的发展形式到内在的发展机制、价值体系构成的统一体，数量指标容易达到，而制度内涵不容易建立。因此，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艰巨性不容低估。对制度有效性的评价无法用一些客观的指标加以判断，不得不采用主观评价的方式，而主观评价主要依靠他评而不是自评。因此，中国

的大学和学科是否达到世界一流，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宜制定一份一流大学和学科目标实现的时间进程表。

**误区 3：跨越式发展，超越必要的历史阶段。**后发外生型模式常常与跨越式发展模式相伴随，尤其在集权体制下两者容易共生。对于后发外生者而言，容易看到表面的目标并低估实现总体目标的难度，所以在制定发展规划时容易出现激进，以跨越式作为制定激进政策的工具。有些发展目标可以跨越，而有些目标则难以跨越，制度建立及其功用的发挥就是难以跨越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跨越式发展模式是以牺牲历史承继性和自洽性为代价的，容易产生知识创造和传递上囫圇吞枣、食洋不化的问题。

**误区 4：以牺牲多数高校利益为代价。**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恰当地处理精英和大众高等教育关系的问题。“双一流”属于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部分。在集中财力投入精英部分时，是否会削弱大众部分的基础建设？这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另外，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历史，经过 30 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开始审视过去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继续遇到了环境制约和可持续性的挑战，于是政府提出了“新常态”的发展思路。与经济发展对比，“双一流”建设是属于常态还是非常态发展模式呢？

**误区 5：树立标杆，不利于实现多样化。**办学特色是高等教育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又经常被忽视。一流学

科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上是在树立标杆，这些标杆对其他学科和大学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可能削弱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的特色。一个值得重视借鉴的例证是，美国立法机构多次否决建立“国立大学”的提议，从而为后来美国高等教育多样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与之相较，我国将某些重点学校和重点学科放在特殊优先发展地位，一直对应着明显的院校攀比和升格行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从浅至深分别是：器物技能层次、制度层次、思想行为层次。一般而言，浅层次的现代化目标容易实现，而深层次的现代化目标则较难实现。根据实现现代化的先后顺序，可以将国家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类型或者形态。先发内生型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容易做到现代化三个层面的同步发展，而后发外生型国家则可能出现三个层面的不同步发展，即所谓的“脱序”。在集权管理方式下，后发外生型国家的追赶心态和容易采纳的跨越式发展模式侧重于强调器物层面的建设，而忽视制度建设，因此容易出现“脱序”问题。大学是一种制度性的组织，制度是在长期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的积淀赋予大学制度以独特的内涵，需要长时间涵养才能获得，无法在短期内通过跨越实现。（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1期 作者：阎凤桥）

## 年轻大学借助国际化走向一流

世界年轻大学排行榜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推出的六大排行榜之一，主要是对全球范围内校龄低于 50 年的大学进行排名。从 2016 年的榜单来看，年轻大学表现卓越，均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部分大学甚至已经跃居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前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由于世界年轻大学排行榜与世界大学排行榜采用相同的指标体系，为了探究世界年轻大学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我们将年轻大学与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传统大学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年轻大学在国际化指标得分上明显优于传统大学，成为年轻大学走向成功的关键。那么，年轻大学是如何发展国际化的？国际化又是如何帮助年轻大学走向成功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为年轻大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 确立国际化的远景目标

年轻大学在创立初期，立足国际化的外部环境，对本校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的地位和机遇进行分析，纷纷确立了全球化的发展目标和愿景。如香港科技大学将学校定位为“一所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而又致力于为本地服务的优秀学府”。南洋理工大学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快速崛起的全球化研究型大学”。浦项科技大学在学校的发展远景上写到“培养未来全球的领导者和发现、解决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年轻大学将服务国际化、发展国际化，甚至是成为国际化的佼佼者作为学校办学的使命和目标，成为学校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秉持着国际化的发展远景和目标，年轻大学竭力塑造开放、自由、透明的校园文化和组织氛围，鼓励教师和学生追求国际交流、合作与学习，并将其作为走向卓越的组织基础。

### 实施国际化的人才战略

年轻大学将扩大国际学生和教师数量作为国际化的基础，从数据上看，年轻大学的国际教师比例平均为 **18.6%**，传统大学为 **13.9%**；从学生来看，年轻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平均为 **16.6%**，传统大学为 **12.7%**。通过吸引全球精英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已成为年轻大学的普遍做法，如浦项科技大学 **80%** 的教师来自国外或具有国外大学博士文凭，从 **2010** 年开始该校投入 **10** 亿韩元招聘了 **10** 名诺贝尔奖或菲尔茨奖级别的世界级学者，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了学校的科研实力。同样，英国邓迪大学通过引入全球优秀研究人员，建立了欧洲最大的生物化学实验室，该实验室目前拥有来自全球 **60** 个国家的 **900** 多名科学家。

在吸引顶尖学者的同时，年轻大学还注重增加外国优秀留学生的比例。诚如波士顿大学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Hans de Wit 所言，吸引优秀外国留学生成为英、法、德等国家的年轻大学获得良好国际声誉的重要法宝。年轻大学通过拓展学生海外项目、增加优秀学生奖学金、增加国际学生的招生



名额、推进英文课程教材建设等举措增加国际学生的比例。如浦项科技大学从 2010 年开始启动“英语通用化校园”计划，把英语定位为校园正式语言，除授课外，在学位论文、学术研讨会、行政会议、文件发布等方面也逐渐用英语代替韩语。马斯特里赫特大学采用“泛英语课程”吸引国际学生。在这些政策举措下，年轻大学不仅在国际学生的平均比例上高于传统大学，甚至在部分高校的学生构成中超过半数为外国留学生，如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国际学生比例达到 58%。国际化的学生群体促进了学校教学的活力，并激发学校不断改进教学质量，对提升学校的教学声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鼓励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一方面，年轻大学注重建立国际交流合作网络，如香港科技大学已经与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的 36 个国家约 380 个单位结成伙伴关系，是“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和“环太平洋大学协会”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唯一成员大学。再如南洋理工大学与超过 30 个国家的 100 个大型企业、150 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构建国际交流的合作网络，年轻大学不断向外界塑造开放、合作、自由的声誉，增加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合作成为国际合作的核​​心，年轻大学通过建立跨校区的研究合作、成立跨国研究中心、设立国际性研究分中心、开展联合攻关项目等举措，与国际上顶尖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展开高水平的科研合

作。如香港科技大学在 2014—2015 年投入 1.6 亿美元支持国际科研合作，同年度该校参与了国际上的 157 个合作科研项目，获得 1.09 亿美元的科研经费。为了进一步扩展学校的科研合作，该校还在欧美地区设立研究所，强力打造学校的科研实力；卡尔加里大学通过与各国石油企业的研究合作，逐步将石油工程打造为全球一流的学科专业；昆士兰科技大学从 2006 年成立健康与生物研究中心以来，已经与全球 1500 家医院、政府和研究机构展开了科研合作，逐渐塑造了该校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卓越声誉。

世界年轻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能够反映出一国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也是一国高等教育寻求国际认可、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年轻大学为了寻求国际认可，还积极主动对接国际标准，寻求国际同行评价，包括学科专业的国际认证、研究项目的国际评价、教育教学的国际评估等。

### 学习世界年轻大学的国际化经验

中国是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大学整体呈现年轻化的特征。当下，我国正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力求在短时间内将年轻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水平。由此，学习世界年轻大学的办学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大学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雄心。除了少数国内一流大学外，我国大学普遍将发展眼光局限于国内，缺乏国际化的视野、使命和担当，归根到底是缺乏办学自信。高等

教育的举办者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及产生的国际影响，尤其是我国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强劲表现，坚信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力。在办学过程中，应该放远目光，对比国际，树立标杆，即便在科研实力上难以匹及世界一流大学，也要在教学质量上对接国际标准，办出国际水平。

其次，大学要积极寻找国际化的突破口。大学要全面国际化，需要以强大的资源支持和一定的实力为基础。世界年轻大学往往选择某一方面作为国际化的突破口，如亚洲的年轻大学侧重科研的国际化、欧洲的年轻大学侧重学生交流的国际化。我国年轻大学在开展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应该有所侧重，或是始于学生的海外交流，或是侧重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还可以打造海外实习基地等，通过以点带面、步步为营的策略，逐步推进国际化。（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04日 作者：朱炎军  
夏人青）

## 大学综合改革再起为“双一流”建设探路

北京大学昨天传出消息，北大将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改为聘用制，恢复这些院系负责人的学术责任人身份。

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实施的综合改革方案，在推进两年后终于有了一大突破。北大校长林建华昨天公开表示，院系的管理者大部分是教师，很多人并非为了职级发展，而是出于对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的热爱和责任心承担了院系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是一回事儿，我们要把制度建好，队伍环境建设好，一所高校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自然就会提升，一流大学也就形成了”。

对这一改革措施，不少高校的校长和学者认为，它将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有助于释放高校科研人员的学术活力和创新能力。不过，由于触及高校人事制度，这一轮改革能否找到有力的抓手，仍充满悬念。

### 高校人事改革向深水区推进

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去年起制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从教育体系、人事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 5 个方面进行。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改革还未开始，目前北大聘任制主要是在教师队伍和学术机构的管理层推行。对于院系层面，包括

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系主任和副系主任，其职务会跟行政级别脱开，相关文件正在制定中。

在国内高教界人士看来，作为国内高校的排头兵，北大此举再次表明，高校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正在向深水区推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北大和清华是国家“两校一市”教育综合改革中的“两校”，对他们来说，这轮综合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找出抑制高校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并在梳理问题的基础上拿出解决方案。比如，在体制机制管理层面以及教学科研层面，哪些问题抑制了大学的学术创新活力。对北大来说，朝着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进军，一些体制机制的痼疾亟待破解，改革迫在眉睫。

目前，高教界人士议论颇多的一点是，不少二级学院的院长一般都由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和丰富管理经验的知名学者来担任。问题是，由于他们有了行政级别，根据目前干部管理的相关规定，其参加学术活动的范围，包括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等都会受到影响。根据北大最新的改革设想，在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以后，将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任方式。

### 高校去行政化曾经遭遇阻力

事实上，在 2010 年前后，国内不少高校的校长和学者们就建议取消校长及二级学院院长、系主任们的行政级别。有高校人士记得，在这一轮高校的综合改革浪潮中，朱清时

等一批知名校长都是旗手，而同一时期，天津大学等一批重点院校在向全球招聘院长时，都提出过淡化行政级别的想法。

按照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满生的看法，大学在推出“去行政化”改革举措时，往往希望能淡化或取消二级学院院长的行政级别，建立扁平、高效的治理体系。有的高校甚至希望能够移植国外大学的人事管理制度。但是，照搬美国模式，即对从事教学、科研的人员和对从事行政管理的人员实行“两条线”管理，从目前看来，在本土高校还行不通。

所以，在新一轮的高校综合改革中，北大、清华等高校如何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改革，比如，淡化行政级别究竟淡化到哪一级？原有的院长、处长因其行政级别而在退休后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该怎样执行？这些都是改革的看点和难点所在。

### 一揽子政策为改革铺平道路

在周光礼看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改革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本来存在的阻力，如今有缩小的趋势。

林建华说，高校综合改革是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只有在一定条件积累的过程中，才可能有所突破。而此次北大提出将取消院系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近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这一改革的条件相对于以往更加成熟了。

就在这两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某高校政策规划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校承担着科研创新的重要责任，逐步弱化其科研管理人员的行政化特点，才可能释放科研人员的活力。

可见，这一头，高校可以放权，弱化院长的行政级别；那一头，国家开始“松绑”，允许教师合规兼职兼薪。有专家认为，因政策组合拳而产生的红利，会吸引一部分知名学者回归院长岗位，继而进一步释放科研活力和学术创新力。

（《文汇报》2016年11月11日 作者：樊丽萍 姜澎）

## “双一流”建设中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型发展的若干思路——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

从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整体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发展和普及化程度的加快，其通常都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转型发展。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在其 60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经历了“四次转型”：从单科性工科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科大学；从多科性工科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从教学型大学转变为教学研究型大学；从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为应用研究型大学，目前正处于第四次转型的重要关节点上。笔者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阐述“双一流”建设在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型发展中将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一、“双一流”建设为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学科水平与大学发展水平之间呈高度正相关，学科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的地位和学术声誉。“没有一流的学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势、办出特色。”与“985 工程”“211 工程”相比，“双一流”建设打破了高校的身份固化，给所有高校提供了一个“同台竞技”的良好平台，这就为地方高



校特别是不具备“211工程”身份的地方高水平大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双一流”建设要求地方高校必须扎根区域，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区域经济社会共建发展共同体。

从政策目标看，“双一流”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从政策契机看，“双一流”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既有历史传承性，更有现实创新性，它打破了“985工程”“211工程”身份固化、竞争缺失、机制不活、重复交叉等弊端，为我国“量大面广”的地方高校尤其是担当省属高校“排头兵”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内涵发展、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提供了政策机遇。从政策实施看，我国一些省（市、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为了有效对接国家“双一流”，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出台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双一流”建设“地方方案”，如广东省启动了“7+7”区域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计划，浙江省实施了“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等等。“双一流”建设的深入实施为地方高水平大学的转型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和发展动力。

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6年3月10日，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认为：中国高校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认为：推动高校转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所依存的那个经

济社会的大环境在转型，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必然要求高校的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模式做出相应调整。“双一流”建设适应了我国高等教育向内涵建设转变的态势，加快了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向应用研究型大学转型发展的步伐。

## 二、“双一流”建设倒逼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进行科学定位

办学定位对一所大学来说至关重要。办学定位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反映大学的地位（在国家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作用）和方位（过去、现在和将来发展目标），还反映大学的品位。浙江工业大学提出的“建设区域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就实现了水平定位与特色定位的有机统一。

### 1. 区域特色鲜明

区域性大学是指那些暂时不具备全球性和全国性服务能力与资源拓展能力，但却能在特定区域内形成比较优势，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的大学。区域特色鲜明的大学强调“高水平的科研立足于当地的区域特色，并且科学研究及产出主要为该区域发展服务，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该区域来说具有不可替代性。”

作为一所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为主要职能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地域性是在找寻自身办学目标定位时首先需要考虑的对象，也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标签和生命力所在。长期以来，浙江工业大学始终坚持“以浙江精神办学，

与区域发展互动”的办学特色，实施特色化、综合化、卓越化和国际化发展战略，发扬“艰苦创业、开拓创新、争创一流”的精神传统，有效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较好地发挥了人才泵、创新源、思想库的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学校成为国家“2011计划”首批牵头高校之一，成功入选“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目前浙江工业大学正处于由区域性大学向全国性大学转型中，但无论是区域性大学还是将来成长为全国性大学，区域（主要指浙江）始终是办学的立足点和基石，这是学校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所在。

## 2. 综合性

在地方高水平大学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进程中如何保持特色发展和错位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特色是一所大学水平、质量、品位、个性的标志。世界各国的综合性大学从来都是在办学理念、学科结构、制度建设等方面各具特色。如学科设置综合化并不意味着设置每一个学科，而是根据自身情况和学校之间分工而有所取舍。错位发展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在竞争比较激烈的区域办学环境中采取的一种巧妙的发展思路。“提高竞争力的策略就是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凭借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来争得一席之地”。想与国内传统高水平大学比肩，同步进行各项质点的建设，拼资源，拼投入，无疑是用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短处去拼传统高水平大学的长

处，将自己逼进“死胡同”。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由于浙江大学学科齐全，只要浙江工业大学有的，浙江大学基本上都有，而且水平和层次更高，那么浙江工业大学如何定位和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实力和优势，答案就是错位发展。由于浙江大学定位为世界一流大学，它的眼光是瞄准世界一流大学一些质点，这就使得在它身后留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形成事实上的“真空地带”，浙江工业大学要巧妙地去补浙江大学发展留下的空位。在学科重点方向、重点项目和重点计划布局上，要与浙江大学尽量形成错位，浙江大学已经有的，学校尽量少布局、甚至不布局，即使布局也要在研究方向上有侧重点，浙江大学做学科、产业上游，浙江工业大学就做学科、产业中游和下游，更加接地气。

### 3. 研究型

如果说区域特色强调的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审视自身办学条件之后横向拓展办学空间和资源而形成的范围量度，那么研究型则是在审视自身办学能力后纵向确定办学内涵而形成的内涵量度。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博耶提出了新的学术范式划分，他将大学学术分为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学术研究型大学主要以发现学术为主，即主要以新知识不断建构和新知识创造为主；应用研究型大学则主要以综合的学术和应用的学术为主，即知识的综合应用与发展，以应用性视角去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要求知识创新。主要包括：一是此

类院校不以知识创新和生产为主要目标，但以创造性地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并推动实践发展为主；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新问题和探究新知识。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共同形成应用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新和应用体系。因此，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代表的地方高水平大学走的是应用研究型发展道路，即以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与传统的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型大学有显著差别。

### 三、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型发展的主要问题

从外部大环境看，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新需求，我国高等教育总体面临着供给侧改革的压力，需要高校提供能有效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一大批知识、技术、人才，教育部期望相当一部分本科高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就集中反映了社会的这种需求。笔者以浙江工业大学为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论述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从宏观看

一流学科不足和高端人才集聚不够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学校向高水平大学迈进的根本性问题。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地方需求的对接度不够紧密，学科短板明显，学科方向需进一步凝练，学科高峰尚未形成，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面临极大挑战。面对高层次人才白热化的竞争形势，领军人才、青年英才、国际化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进与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重点团队的人才梯队建设需进一步

强化，全员引才育才的工作格局尚未形成。

## 2. 从中观看

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产出、服务发展能力、国际化程度、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不足是影响学校上层次、上水平的关键性问题。人才培养定位不够清晰，学研结合、科教融合、寓教于研、科研反哺教学的机制尚未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教育教学举措需进一步落地，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质量需进一步提升。标志性成果的培育对象不够清晰，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的国家、省、学校三级协同创新中心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科研重点领域需进一步聚焦，科研组织模式需进一步创新完善，科研创新核心指标需进一步提升，重大科研成果的持续产出与转化机制需进一步健全，科研对经济社会的支撑度和贡献度需进一步增强。教育信息化、国际化滞后学校改革发展进程。“大气、包容、协同、开放”的校园文化需要进一步营造，“厚德健行”校训和“三创”精神需进一步弘扬，教职工的精神面貌需要进一步焕发。

## 3. 从微观看

办学资源短缺、内部治理体系不尽合理、推动和服务发展的能力不足等是影响学校实现阶段性发展目标、实现跨越发展的制约性问题。学校发展面临资金、空间等多方面的资源瓶颈，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发展支撑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内部治理结构还需进一步完善，基层办学主体的办学理

念、办学能力、对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关职能部门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

#### 四、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高校整体面临一个转型发展的问題，具体到高等教育内部，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压力更大，转型发展、内涵发展、跨越发展是地方高水平大学面临的共同使命。从战略层面进行研判，摊大饼、简单地靠多布点进行规模扩张制胜的发展模式已日趋式微，高校进入分层分类发展、争一流、创特色、以质图强的新常态，需要在新形势下抢先把握发展机遇，占得先机，取得发展制高点和主动权。浙江工业大学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地方高水平大学转型发展的新模式。

##### 1. 以一流学科建设为主线，着力打造五大优势学科群

一流学科是高水平大学的标志和基石。通过对很多著名大学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轨迹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来自三条基本路径：一是将已有的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做大做强；二是积极融入国家、区域和行业的重大发展战略，在满足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过程中成长、壮大，实现“弯道超越”；三是立足新的科学技术和学科发展前沿，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培育出新的学科，异军突起。当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很多大学的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是两种、三种路径的叠加，这些经验对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启迪。对于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当前以一流学科建设为

主线，进行人、财、物等资源要素的配置，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布局，是顺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契合世界高水平大学发展历程的需要；是推进“双一流”建设，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特色发展、内涵发展的需要。具体到浙江工业大学，则是落实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建设高等教育强省的需要；是集聚学校各种办学资源，聚焦发展领域，实现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

浙江工业大学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先为，有后为”的原则，从本着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分层分类发展和存量促转型、增量调结构的建设思路，按世界一流学科（个别，培育）、全国一流学科（部分，强化与世界一流学科的协同）、省特色优势学科（一批，作为学科金字塔的基石）的纵向维度，以及优势学科、支撑学科和学科支撑（辅助学科）的横向维度，进行学科重点布局、重点投入、重点建设。整个学科体系按照一级学科规划建设，每个学院原则上重点发展一个一级学科，每个一级学科重点建设3~5个特色方向。以化学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药学、生物工程等8个学科为主导，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11个学科为有效支撑，推动辅助学科特色发展，全力打造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学科水平的快速提升。对接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以8个一流学科为基础，以11个支撑学科为依托，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通过跨组织的协同与互动，拓展学科发



展空间，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着力打造“绿色化工”“生命健康”“先进制造”“经济管理”“文创设计”五大学科群。

## 2. 以高端人才集聚为突破口，扎实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人才资源是战略资源。在所有资源中，人才资源特别是学科重点方向所需的高端领军人才和潜在高端人才，对任何一所高校而言，都是最为稀缺的战略资源。当前，高校之间围绕高层次人才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地方高水平大学非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与人事制度改革，切实将其作为支撑学校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来看待；同时通过岗位聘任等人事政策手段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产出率。

浙江工业大学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围绕学科建设规划进行有选择地引进、有计划地培养，通过提供空间、平台、待遇、文化氛围“四位一体”，建立健全“院士-领军人才-青年英才-优秀博士后”系统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体系，确保到2020年有30多位在各自领域很有影响力的拔尖领军人才。对于新进年轻教师，要先后过“三关”（科研关、实践关、教学关），经过2-3年博士后培养，再经过半年的企业实习、半年助教，通过3-4年的职前训练再走上教师岗位。实行岗位设置、岗位聘任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考核的“三合一”，淡化资格、强化聘任、评聘结合，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建立真正意义上以岗位为核心的“岗位聘任制”人员管理体系。同时，通过灵活的政策设计，依托“运河特聘

教授”“校聘教授”和“校聘副教授”等岗位，打破既有利  
益格局，为业绩突出、成长潜力比较大的人才打通政策通道，  
解决优秀青年人才在“三合一”制度下难以越级聘任、待遇  
受损等问题，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3. 以协同创新为抓手，重点提升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  
的能力

科学研究，特别是重大科学研究的能力是衡量地方高水  
平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尺。科研发展有一条经纬线，经线  
就是“顶天立地”（方向对接国家战略需求，脚踏区域大地，  
做好服务），纬线就是校内（打破学科、学院等壁垒，实现  
资源集聚和共享）、校外（拓展与社会的深度合作，加快产  
学研转化）两个协同创新，做到了这两点，科研就活了。首  
先，在科研方向上，坚持“两条腿走路”，鼓励在理学等基  
础学科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但更要重点突出应用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其次，在科研组织模式上加快推动一系列的重  
要转变：从个体散兵游勇向团队式组织化合作发展转变；由  
被动适应向主动对接产业问题转变；从面向一般问题向面向  
重大战略目标转变；从松散型小团队向团粒状科研组织体系  
转变，从以量的扩张为主向规模质量联动提升转变。另外，  
要有大战略意识，瞄准科学技术发展前沿，面向国家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着力创新科研组织模式，组建大团队、  
打造大平台、承接大项目、培育大成果、作出大贡献。

作为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只有更加紧密地和区域科技

创新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服务、做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为学校发展赢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和发展机遇。作为区域高等教育体系龙头，浙江工业大学承载着主导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职责。2016 年 6 月，浙江工业大学与浙江省工业与信息化研究院共同发布了《浙江工业大学社会贡献度蓝皮书（2011—2015 年）》。作为国内高等教育界第一部以“社会贡献度”视角编辑的专业报告，蓝皮书全面梳理了学校“十二五”期间人才、学科、科研的建设成绩，全景展示了学校这一时期的社会贡献情况。通过发布社会贡献度蓝皮书，希望更好地建立学校与社会外部的沟通机制，全国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新闻报道，取得较好的社会影响力。未来学校要坚持“顶天立地”，立足区域，紧密对接区域战略需求，找准契合点，深度介入，做精做强，进一步提升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力：一是要加快构建分层对接的社会服务体系，即学校与地方政府对接、学院学科与各大产业（浙江七大万亿级产业、浙江九大战略新兴产业）对接，各研究所及团队与产业园区、企业对接，形成政产学研合作的新格局；二是要做实地方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载体，把学校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出去，把产业关键技术的重大需求凝练出来带回学校、协同攻关，为技术转化与成果培育提供平台保障；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出台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将成果转化的大部分收益用于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4.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全力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和高水平研究生教育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任务，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所独有的功能。地方高水平大学应有长远的战略基点，将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根本职责或战略基点，放眼长远。

浙江工业大学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全力打造与应用研究型大学发展定位相适应的一流本科生教育和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引领、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体、复合型人才培养为特色，为浙江乃至全国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与国际视野的骨干人才和领军人才。主要改革举措：一是实施“专业动态调整与内涵提升计划”。深入贯彻“把专业建在优势学科上”的理念，加强学科、学位点、专业的一体化建设。建立以学科水平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为依据的专业设置、改造、退出的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应对2017年本科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完善按类招生办法和“三位一体”自主招生制度，建立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大类专业分流的教学和管理体系，实现“招生-培养-就业”有机联动。二是树立“产出导向”教育理念，实施“培养方案优化工程”，包括“核心课程建设计划”“课堂教学创新计划”“实践教学提升计划”“专业实践基地建设计划”等。三是实施“创

“创新创业教育提升计划”。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创业通识、创业辅修专业、技术+创业复合专业“三层创业教育体系”，建设创新创业教育普及型课程-创业实训提高性课程-创业孵化实战性课程“三层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四是实施“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计划”“研究生导师素养提升计划”“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工程”“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升工程”和“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等，从招生、培养、出口三个环节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5. 以国际化和信息化为路径，加快推进学校跨越式发展

国际化、信息化既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又要深入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等领域中，综合发挥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化和信息化犹如助推大学腾飞的两翼，许多地方高水平大学纷纷将其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战略，加快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当前，浙江工业大学应加强全球意识，把握实施“浙江省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工程”的发展机遇，深入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以有效合作、深度合作为重点，建立考核联动机制，把国际化融入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科学研究中，加快人才、师资、管理骨干培养的国际化进程。对于国际化怎么理解？核心有一条，即工大的干部，有国际视野；工大的教师，大部分有出国经历；工大的学生，通晓国际规则，有出国经历与背景。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等有关政策密集出台，尤其是2016年6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发布，信息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浙江工业大学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德清校区启用，多校区办学格局的进一步形成，学校的内部治理、科学决策、高效服务、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对信息化的要求进一步提升。实施“一站式”信息化综合应用工程，围绕智慧网络、智慧服务、智慧学习、智慧决策四条主线，建立虚拟化、大容量、高安全的综合型一体化校园信息公共服务支撑平台。建设智慧校园基础网络支撑环境，建设校园“一站式”网上服务信息化综合应用体系，建成学校事业发展大数据系统、图书信息支持与资源发现系统、多校区视频会议系统、网上办事大厅及移动应用服务系统等，促进学校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校长）

（《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10月20日 作者：蔡袁强）

## “111 计划” 将建 100 个世界一流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日前印发《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实施与管理办法》。《办法》明确，“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 计划”）基地 5 年进行一次周期性评估，评估工作由“111 专委会”或委托第三方专家组进行，对于未通过评估的“111 基地”将被要求整改或淘汰。对建设成效显著、验收结果良好的“111 基地”可继续滚动支持 5 年。

据介绍，“111 计划”是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等学校自主创新的重大举措，其目标是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从世界排名前 100 位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进、会聚 1000 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配备一批国内优秀的科研骨干，形成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建设 100 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以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故简称“111 计划”。

《办法》对入选“111 计划”支持范围和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其遴选范围包括中央高校和地方高等学校。在学科基础方面，依托学科应为国内一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有国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平台，具有良好的国际合作研究基础。在人员构成方面，应聘请 10 名以上海外人才团队，其中包括：1 名以上国际一流学术大师，5 名以上高水平学术骨干；

或成建制 10 人以上国际一流海外团队。国内人才团队 10 人以上,其中包括 5 人以上优秀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拔尖人才。

其中,国际学术大师应为外国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或国际公认的一流专家学者,其学术水平在国际同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取得过国际公认的重要成就。在国内工作时间,每人每年原则上累计不少于 1 个月。

《办法》规定,“111 基地”一个建设周期为 5 年,每个基地须从建设期首年度开始建立年度进展报告制度,每年根据相关通知要求将进展报告报送“111 计划”管理办公室。

“111 基地”实行中期绩效检查制度,对立项建设后满 3 年的基地进行中期绩效检查。对中期绩效检查中出现的明显未达到引智计划要求、保障条件不能落实以及其他因人为因素严重影响基地正常建设的,要求予以整改或中止建设。

(《中国教育报》2016 年 12 月 01 日 作者:刘博智)



## 山东大学出台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

近日，为落实《山东大学综合改革方案》要求，破除学科发展障碍，激发释放学科活力，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山东大学印发《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山大字〔2016〕40号）（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系统梳理了山东大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立了“统筹布局，一体发展”“分层规划，差异建设”“学科引领，资源统筹”“三‘位’一体，特色发展”“拓展资源，开放办学”的改革发展思路，明确了推进学科现代化、国际化、融合化，以及到2020年前后5个左右学科进入国际主流排名全球前百名、15个左右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进入前十名、4个左右学科进入ESI前1%、8个左右学科进入ESI前2%等改革发展目标，提出了一系列重点改革发展任务。

实施“学科高峰计划”，打造一流高峰学科。《方案》提出了“学科高峰计划”的首批重点学科建设任务：重点建设中国语言文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3个优势学科，冲击世界一流水平；重点发展考古与历史学科等16个特色学科，打造国内一流的学术高地；重点扶持精准肿瘤学等4个新兴、交叉学科，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

凝练学科方向，调整学科结构。《方案》提出按照“升位、错位、占位”的要求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

凝练学科方向，突出发展重点，推动学科升级和学科现代化，有效解决学科老化和碎片化问题。统筹推进“学科整合计划”“本科专业现代化工程”和“研究生学位点动态调整计划”，构建起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融合发展的学科体系。

发挥学科综合优势，推动学科交融发展。为了推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方案》提出了建立实体性或非实体性的跨学院研究机构，实施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出台有利于交叉学科发展的倾斜和激励政策，以及搭建不同学科间的学术交流平台等有利于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

凝练三地办学特色，优化学科空间布局。《方案》提出要按照“统筹布局，一体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凝练济南、青岛、威海三地办学特色，完善青岛校区的学科布局，推进济南各校区和威海校区的学科调整，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学科加快发展。

推进学科机制改革，激发学科活力。《方案》提出启动学部制改革，完善学校—学部两级管理体制，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强化学科平台与基地建设，推进科研组织机制改革，建立竞争、开放、流动的科研组织体系；实施学科评价评估机制与学科建设绩效考核机制改革，以考核评估结果引领学科资源配置，并将考核评估结果纳入教学科研单位及其负责人考核体系。

改革经费管理机制，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方案》提出

以“双一流”为主渠道加强校地共建和校内资源整合，“十三五”期间筹措50亿元投入学科建设；改革“双一流”规划建设机制，围绕学校重点建设学科，统筹布局队伍、平台、科研、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建设内容，集中配置办学资源，实现多位一体的重点建设；统筹“双一流”专项经费、基本科研业务费、各人才专项经费、重点平台专项经费、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等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各专项经费组成学科建设经费，主要分为“学校统筹人才经费”“学校统筹公共支撑条件建设”与“学科自主专项经费”三部分，按照这三大用向对学科进行投入和支持。

此外，《方案》还提出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学科国际化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支撑学科建设、对接其他专项改革方案的改革任务。

（山东大学新闻网 2016 年 11 月 30 日）

## 江苏大学：开足“双引擎”，聚力“双一流”

“十二五”以来，江苏大学聚焦内涵提升，确立了“高水平、有特色、国际化”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引领下，学校通过大力实施“国字头”和国际化两大工程，有力推动了高水平大学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5年11月，国务院正式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吹响了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号角，为我国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苏大学作为农业工程学科特色鲜明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一方面要找准学校自身发展战略与“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融合点，积极作为，努力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多做贡献；一方面要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提升内涵、强化特色，通过“双一流”建设的突破，实现学校事业的新跨越。基于此，我们的思考是：开足“双引擎”，聚力“双一流”。

引擎之一：

优势特色学科引领

学科是构成大学的基本元素，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石。“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就是一流学科建设。这就赋予了高校优势特色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神圣使命。要发挥好优势特色学科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必须要鲜明突出两个聚焦：

一是要聚焦学科学术逻辑，提升学科实力水平。学科学术逻辑是指学科的学术水平。根据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工具——ESI，目前我校以5个学科跻身ESI全球学科排名前1%，并列全国第37位，并列省内第4位，这就是显示学校学科水平，并在未来发展中可资与“世界同类高校”进行对比的重要参照。为此，“十三五”学校学科建设就是要在“合理布局、优化结构、交叉发展、突出重点、形成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促进ESI潜势学科发展的相关政策，全力打造大农业工程学科群。“十三五”末，力争新增ESI前1%学科2~3个，1个学科进入全球2‰。同时，建成10个左右在国内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的学科，打造一批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应用学科，拓展一批与学科发展趋势相适应的新兴、交叉学科，建设形成能够支撑一流学科建设的学科高原。

二是聚焦学科社会逻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学科社会逻辑是指学科建设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尤其是一流学科更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领域，精准发力。江苏大学作为国内最早设立农机专业，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农机本科、硕士和第一位农机博士，并在农业工程领域获得8项国家科技奖、2项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3篇全国“优博”，且服务江苏地方经济7个方面的指标中6个方面的指标均居全省前列的高校，在服务国

家重大需求、推动江苏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向江苏现代农业建设，重点就是要围绕《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以建成苏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先行区为目标，着力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通过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对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的引领示范作用，促进我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引擎之二：

国际化战略助力推动

“双一流”系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因此，国际化必是“双一流”的题中之义。据此，我们将实施三大战略。

一是全球视野的人才队伍建设战略。聚集一批世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和大师，是一所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关键。“十三五”学校将大力实施“金山学者计划”，围绕重点学科发展方向和重点科研领域，重点加大海内外从事重大原始创新研究和有望实现重大突破人才的引进力度，着力构建形成层次分明、梯度合理的高端人才金字塔结构。到2020年，建设形成一支以15~20名左右能够参与国际前沿竞争并产生国际重大研究成果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高端人才，80~100名左右带领本学科保持国内外先进水平的优秀学术带头人为代表的优秀人才群体，努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师资保证。

二是面向世界的一流人才培养战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学校始终坚持国际化办学方向。目前学校留学生达到1700余人，来自103个国家和地区，留学生中学学历生13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180余人，留学博士后31人，学历生规模列全国第42位、江苏第2位。在此基础上，学校将进一步把来华留学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规划，紧紧围绕国家外交战略布局，按照规范管理、提质增效的要求，积极拓展中美、中欧人文交流奖学金以及中蒙、中坦、中埃和中印尼等专项奖学金项目，全力做强来华留学教育。“十三五”学校还将建设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本科国际化专业和本科生国际化课程，进一步加大学生海外游学政策支持和工作推进力度，确保“十三五”末，在校生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比例本科生超过5%、硕士生超过10%、博士生超过30%。

三是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科技战略。近年来，学校相继建成了包括“中澳功能分子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以及“中美合作鲜切产业研究院”“世界食品保藏研究中心”“中丹材料学联合实验室”等一批中外合作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十三五”学校将进一步建设5~6个高水平中外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等高层次国际创新平台，要通过国际创新平台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努力实现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的突破。（作者系江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新华日报》2016年11月29日 作者：袁寿其）



## 学派消失大学难以卓越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先后出台，“学科”一词频频闪现。2002 年起，经由“学科评估”推波助澜，学科建设“喧嚣尘上”。大学先后制定规划，高薪延聘“学科带头人”；学者大显神通，辗转于学科内外，驰骋于院校之间；评价机构适时推出诱人的“排行榜”以博取眼球。最近，在“双一流”的语境之下，“学科建设”掀起了又一次高潮。然而，精心细想，我国近 3000 所高校，十余个学科门类，下设上百个一级学科及无数的二级学科，在各种各样的甄别指标中，独独缺少了“学派”这个充满活力、从内在推动学科衍生的非正式组织。学科的成就及其生命力，往往并不因为其体系庞大，恰恰源自其间“学派”丛生，相互博弈、相互塑造，砥砺前行！

学派衍生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首先，学科是学派形成的基础。西南联大时期，雷海宗、林同济等人因宣扬“战国时代重演论”而合组的“战国策”派，即一个涉及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综合性文化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人物的“魁阁学派”和以陈达、李景汉等为核心人物的“文庙学派”便是当时“社会学科中国化”的分支派别；上世纪 20 年代，维也纳的石里克、纽特拉等因信奉数理逻辑被称为“维也纳学派”。当相同或不同学科



领域的学者因为遵循某种共同的学术思想、理念与方法，而分属于若干个学术团体，并同时拥有一些核心成员及代表人物时，学派因此而成。反之，学派有效促进学科发展。“哲学”学科便是在不同派别及同一派别内部的不同论争中得以发展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相互对立，其内部又分别衍生出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等；现象学派，尽管每一位代表人物之主张相似，却也不尽相同，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虽认同意识结构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也既不同意胡塞尔把人最终还原为先验意识，也不同意海德格尔把人的生存还原为神秘的存在，同时也反对萨特把自我的生存还原为自我对生存的意识”。而正是由于不同派别甚至同一派别内部各成员之间相互质疑、“摧毁”“片面掘进”，方促成了学科的整体进步。

学派繁盛直接推动大学成长！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伊奥尼亚学派、柏拉图学园派、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等诸多学派；战国时期已有儒、道、法、墨、阴阳、纵横等诸子百家的存在。起初，学派与近现代大学并非生而连体。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现代大学与学派、学科纠缠不休、分分合合，直到 19 世纪之后，德国与美国大学相继问鼎世界，才真正开启了同生共长的命运之旅。大学之于学派，无疑为其提供了生长与繁荣的绝佳场所，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应运而生成百家争鸣的“学科平台”，容

纳了孟子、荀子、申不害、邹衍等学派人物。另一方面，学派之于大学，可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促使大学走向卓越。西南联大哲学系，围绕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宋明道学的近代化，形成了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和以贺麟为核心的“新心学”两大学派；中文系也汇聚了一大批诸如新月派、学衡派、现代派、京派等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19世纪下半期，以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为中心的“牛津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为中心的“伦敦学派”；囊括经济学派、社会学派、建筑学派、传播学派、数学分析学派、气象学派等为一体的“芝加哥学派”；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主体的“哈佛学派”等等。大学因学派林立而成名。

学派消弥无痕，学科有体无魂，大学怎能卓越！学科的生长、演进与繁荣，固然与外在条件的改善相关，显然也离不开各种各样指标的支持，但决然不可缺少的还是内生的演化机制，学派的存在恰恰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学派不兴，学术何来活力？振兴学科，勿忘滋养学派，营造宽松环境，以使得大、小、方、园、左、右、保守、激进、一流、非一流等学派各适其位，各展其能，各得其所，在相生相克之中相融相汇。如此，学问通达，学府方兴。（董云川，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28日作者：董云川 宋亚萍）

## 改革就要放权给院系

谈及高校内部改革，权力过于集中、管理效率不高、组织协调不力、办学活力缺乏等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针对上述问题，西北大学结合实际，梳理出如下改革思路：

改革的理念是要围绕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围绕学科如何上水平、进位次，围绕“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实施，精基础、强应用、促结合，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激发活力，形成新的增长点；

改革的途径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集中反映深层次问题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改革的核心就是深化校院两级体制改革，实施“一院一策”，实质就是放权给院系，做实二级学院教学科研和办学主体地位，激发基层活力；

改革的内容要从机制创新、政策调整、投入增加三个方面着手；

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统筹管理、分类指导的管理模式，统筹管理就是要从战略性、全局性、关键性的角度，做好顶层设计，解决院系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事情。具体说，就是解决协同和共享的问题，协同学科力量，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增长点等；共享学科学位点、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分类指导是基于学科实际，解决差异和特色的问题。文、理、工的差异，学科内部不同方向的差异，都需要

差异化对待。比如，基础学科要“养”，要少而精，应用学科要“放”，要大而强。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出学科的特色和优势。

建立统筹管理、分类指导的管理模式，旨在明确院系是学校的办学主体、教学科研主体、质量主体，推进学校管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让办学主体和专家学者具有学术行动能力和资源掌控能力，最大程度激发“院系办大学”的力量和活力，将学校发展的牵引力由普通火车的“车头带”模式变为动车组“节节发力”的同步同向模式，从而激发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积极性，释放开放办学活力。学校层面主要做好宏观决策与管理服务，处理关系学校改革发展的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重大事项。教师聘用、科研项目管理、课程设置、资源使用等都授权给院系，使院系在人、财、物管理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为深入推进综合改革，西北大学专门强化了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配置，由两位校级领导分别担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以便于统一协调处理改革日常事务，落细抓实改革事项。为使改革稳步推进，学校启动了院系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已审议通过了生命科学学院、地质学系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其他院系也在结合实际加紧制定本单位深化改革方案。生命科学学院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主要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人事制度、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研究生培养、本科教学、国际化建设、实验办公用房十个方面进

行改革，印发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学校将教师职务评审、教师选聘的权力下放生命科学学院，赋予其诸多自主权；地质学系主要从引育世界一流队伍、培养世界一流学生、产出世界一流成果、建设世界一流平台、开展世界一流交流合作等方面深入推进改革，推出了一揽子办法举措。学校同样将教师入职、研究生招生及指标分配等权力交给了地质系。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如何保障管理重心下移后学校层面和院系层面都能各司其职，顺畅高效运转？在这个过程中，学校职能部门就需要及时适应院系改革的趋势，不断进行职能优化、流程再造，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对接好院系改革的各项工作。基于此，学校开展了机关效能建设，旨在不断强化管理服务理念、改进工作作风、提升能力水平。与此同时，为解决院系人才的团队建设，学校创新机制，先后设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宏观经济研究院、关学研究院、汉唐文学研究院、玄奘研究院、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科学史高等研究院等一批无行政级别的学术实体机构，实施首席学术专家负责制，真正使学术回归学术本质，让专家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

一石激起千层浪。院系改革试点实施仅仅几个月，学院的工作就回归了常态，青年教师不再要课抢课，坐回了实验室，专家教授回归了讲台，广大教职员工谋事的氛围强了，

做事的动力足了。生命科学学院、地质学系的师生认为院系改革试点使他们放开了手脚，有了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会，全院上下呈现出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良好局面。以生命科学学院为例，今年以来，学院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3 项、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4 项，在优青（2 项）和国家重大专项（2 项）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完成改革任务，实现改革目标，就必须依靠教职员工共同为改革出招，一起为改革发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才能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只有进一步更新理念，坚持回归大学常识，紧紧抓住人才培养这一本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围绕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大局，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内涵式特色化发展，才能推动学校朝着国际知名的有特色高水平研究型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健步迈进。（作者系西北大学校长）

（《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29 日 作者：郭立宏）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

中国计量大学发展规划处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258 号

邮政编码：310018

网 址：<http://fgc.cjlu.edu.cn/>

电子邮箱：zhanguoli@cjlu.edu.cn

办公地点：明德北楼 403 室、410 室

联系电话：0571-87676156

---